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王达敏 胡焕龙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王达敏 胡焕龙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 王达敏, 胡焕龙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36-7859-3

I. ①中…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397 号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ZHONGGUO WENXUE XIANDAI CHUANTONG DE XINGCHENG

出版人: 郑可

质量总监: 张丹飞

策划编辑: 何客

责任编辑: 何换生 余金锁 邵旻

装帧设计: 张鑫坤

技术编辑: 何惠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网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63683011, 63683013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32.5

字数: 46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王达敏，本名王大明，一九五三年生于安徽枞阳。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第三价值》、《稳态学》、《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余华论》、《论文学是文学》、《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论》、《批评的窄门》等。

胡焕龙，一九六〇年生于安徽凤台。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研究，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文化淮南》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一参与者与主要撰写者，安徽省级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主持省级教育科研项目多项，获安徽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序 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研究”的最终成果。

项目始于2009年,起初是作为安徽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子项目“文学中国与地域安徽”之一种,名为“胡适、陈独秀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进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课题由于受“地域安徽”的限制,将“胡适、陈独秀”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联系起来,虽然突出了前者,但不能为后者建立起自足完整的理论构架。2011年我们在中国文学史及“文学传统”的大格局中建立起明确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学术意识,以“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2014年6月按期完成项目并申请结项,2015年2月顺利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评审,评审专家们对其的评价,令我们满意。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要义和理论构架,我们在结项审批书中作了阐释:

由中国古代文学凝定的文学传统,通常称之为“古代传统”。但这一文学传统演进到清末民初至现代时,在中西文化思潮和文学观念交融创化及文学创作的作用下,则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形成了新的

文学传统,即“现代传统”。这种新的文学传统上承中国古代文学,下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鲜明特征。

本项目成果内容主要研究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路线图”)及其构建的理论体系(“结构图”)。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从发生到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文化的交会时代、世纪之交的新旧“过渡时代”、“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轴心时代”。第一阶段,19世纪中叶来华西方人士和中国近代士人为启蒙民众、改造社会而介入文学革新和文学创作的活动,促进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语体形式等方面发生变革,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文化土壤与精神资源。中西方关于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观念在此融会贯通;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第二阶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发动“三界革命”,高扬思想启蒙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主题,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政治教化与个性解放两大核心传统的精神源头。第三阶段,胡适、陈独秀等人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他们所倡导的崭新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标志着中国文学传统由“古代”向“现代”转换,此后在20—40年代新文学创作实践有力的支持下,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终于形成体系。其演进之结果,是构建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的“结构图”,其主轴/主脉由“思想—文化传统”和“艺术—美学传统”两大系统构成。两大系统互为表里,从根本上反映并决定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面貌和发展趋势。

“思想—文化传统”主要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各种思想观念可归结为现代民族国家诉求和个性解放诉求的两大时代主题。两大诉求互为依托,形成了现代文学互渗互补的两大思想传统:“思想—政治教化传统”和“个性解放传统”。前者有着悠久深厚的本土文化资源,即文学的“载道”、“教化”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转化为“新民”、“启蒙”、“革命”、“救亡”等新形态,承担着

文学变革社会的使命,同时又以此显示出中国文学一贯的民族特性。后者虽有着本土的历史记忆,但更多来自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支持,在思想启蒙大潮中形成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最终凝成中国文学崭新的现代传统。这是中国文学现代传统逻辑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两大核心传统,以此为核心,又派生出两个重要的现代传统:“大众化传统”和“继承—借鉴传统”。前者以白话文和平民意识为表里,充分显示出现代大众文化精神,胡适的白话诗开其端,经“五四”阵营白话文学创作的巨大社会影响,奠定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审美理想,再经20年代“大众化”运动、30年代“文章下乡”运动和40年代解放区“工农兵文艺运动”,最终凝结成崭新的现代传统。后者则体现出在世界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履,显示出中外文学互相借鉴的内在规律。这一传统从清末翻译文学开始,到“五四”时期胡适倡导以西洋文学为范本,经“新青年”团体、新月派、象征派等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全面影响或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以至于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特定“传统”。

“艺术—美学传统”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传统构成主干。在儒家“载道”、“教化”传统文学观念背景下,现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成长于19世纪中后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与西方科学主义语境中的“写实”风潮,经“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倡导及创作实践而基本定型,再经30—4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而凝成强大的文学传统,随后在“断裂”与“新变”中深刻影响着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的基本风貌。浪漫主义传统萌发于“晚明思潮”,滥觞于19世纪末由“西风东渐”酝酿的“情感解放”文学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精神及新文学创作实践,为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反叛精神和自由精神,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区别于古代浪漫主义传统的基本精神。30年代的京派文学、40年代的新历史剧与新浪漫派小说、80年代以后的“朦胧诗”与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小说所开办的浪漫主义思潮,从不同方面延传着“五四”凝结的浪漫主义文学传

统。二者之关系：首先，它们是历时性的。由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既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由“民族解放”到“人的解放”及其深化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在这一时代诉求下中国文学现代美学精神的变迁。其次，它们又是共时性的。两大文学思潮及其凝结的美学传统，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潮。第三，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现实主义文学处于中国文学美学精神大格局的“正宗”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其他艺术流派的发展。浪漫主义与之难解难分，其“浪漫抒情”也总是与具体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相关联。

研究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及其理论的有机构成，实质上就是从根本上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纷繁复杂表象下本源性的“精神运动轨迹”和“精神结构图”，为准确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及其具体文学现象提供内在根据。

在中国文学史及文学传统的大格局中，提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是对“古代传统”的超越与创新，是与新时代同步发展的“新的文学传统”；以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变革创新为线索，研析出明晰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目的是为其建立一个逻辑自足的理论构架与话语体系。

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各种新的文学传统在相互作用中构建的理论体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首创。

结项后，根据评审专家们提出的意见，我们对最终成果作了相应的修改，特别是补写了《艺术—美学传统之三：现代主义传统》一章。我们深知其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比如关于“继承—借鉴传统”能否作为一种“现代传统”，我们一直处于纠结之中，尽管研究成果对其作了充分的论证，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论。又比如项目题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研究”，立项后，我们意识到，将“现代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演变与发展纳入研究视野，无疑会进一步丰富“现代传

统”的内容。但这部分的论述,基本采取粗论形式,各章不是均衡使力,因而深浅不一、详略不一。

这个项目的复杂,其难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设想,七年来(包括结项后修改成果的一年多时间),我们除完成各自承担的另一个项目外,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但我们的合作非常默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项目完成后,尤其是书稿完成后,我们的心中都生发了相互尊重、相互感激的情感。一生中能有这样愉快的合作,实乃人生之幸事!

王达敏

2016年春于合肥

目 录

1	导 论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和结构
3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线图”
31	第二节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结构图”
43	第一章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
44	第一节	从希尔斯的传统观看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
49	第二节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历史背景
80	第二章	启蒙—政治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81	第一节	礼乐文明精神与古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传统
98	第二节	现代中国文学政治化传统的萌芽
119	第三节	现代中国文学政治化传统的形成
147	第四节	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传统的发展演变

174	第三章	个性解放与反叛传统
175	第一节	古代中国文学中的个性精神
180	第二节	近代中国文学的人文思潮
190	第三节	反叛与张扬：“五四”新文学个性解放传统的开创
235	第四章	白话文运动与大众化文学传统
236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民族语文的变革
243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大众化文学传统
263	第三节	“平民意识”与“文学大众化”的深入
271	第四节	新文学创作与大众化文学传统的流变
282	第五章	继承与借鉴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283	第一节	封闭自足中一脉相承的古代文学
285	第二节	历史巨变中“继承与借鉴”文学传统的滥觞
289	第三节	清末与“五四”时期继承与借鉴传统的形成
304	第四节	继承与借鉴传统的现代发展
324	第六章	艺术—美学传统之一：现实主义传统
325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界定及其文学史意义
330	第二节	现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滥觞
337	第三节	“五四”为人生文学思潮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酝酿
368	第四节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发展与变迁

399	第七章	艺术—美学传统之二:浪漫主义传统
400	第一节	近代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402	第二节	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外文化背景
422	第三节	“五四”个性解放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
444	第四节	浪漫主义传统的延传与变异
472	第八章	艺术—美学传统之三:现代主义传统
472	第一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477	第二节	引进与尝试(1915—1924年)
483	第三节	凝结与成熟(1924—1948年)
492	第四节	衰落与边缘化(1949—1976年)
495	第五节	重兴与深化(1976—2000年)
505		参考文献

导 论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和结构

从古迄今,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前者从远古至 19 世纪中叶,约三千年发展历程,后者萌芽于 19 世纪中后期,在 20 世纪呈现出崭新的思想意蕴与美学精神,至今约一百五十年历史。仅仅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从数千年的传统文学中“脱颖而出”,显示出独立的品格和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其属于单纯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以文化学的视角,“现代”的实质,是指 18 世纪以后工业文明模式下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因此,所谓“现代文学”也就是与现代工业文明模式相一致的语言载体、文学体式及美学精神,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充分体现现代文化精神的文学形态。

当这些“现代性”因素进一步内化为人们普遍的审美趣味、审美心态,凝结为明确的文学价值系统,并在人们的艺术实践和社会生活中获得高度认同,使之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正确性、社会权威性和精神感召力时,遂形成本源性的精神力量,即我们常说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获得独立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凝结的新的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它一方面因

继承本民族美学传统而呈现出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因全面借鉴近现代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而充分体现出时代精神。总之,是新的文学传统的凝成,决定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成为具有独立历史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一书中这样给“传统”下定义:“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1〕}也可以这样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2〕}考察希尔斯对传统的论述,其要义有四。一、传统是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代代相传的东西。它是活在当下的历史,是对目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发挥作用的历史遗产。二、传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以“社会信仰”的形态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情感产生着毋庸置疑的感召和规范作用,成为整个社会根本性的精神凝聚力。三、传统的凝结过程是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即外在的重大事件、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圣贤教化,等等,逐步向生活方式、民情风俗、思维方式、文化心态的缓慢积淀过程。四、任何传统的延续,都是围绕其既定的文化主题,适应新的历史—文化环境需要的延传和变异。任何延传中都包含着“变异”,而任何“变异”,即使某些重大的“裂变”,都是以“延续”为前提或载体。

因此,从深层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成长过程,根本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萌芽、形成与凝定过程。系统考察这一过程所呈现的“路线图”,也就是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生与成长历程。与希尔斯对传统的论述基本精神相一致,我国当代学者温儒敏给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作了凝练而通俗的概括:“所谓现代文学的传统,不是虚玄的东西,它

〔1〕 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2〕 E. 希尔斯:《论传统·译序》,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主要指近百年来那些已经逐步积淀下来,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并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规范性力量。”〔1〕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文化的交会时代、世纪之交激进思潮初起的“过渡时代”(梁启超语)、20世纪初期“西化”语境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轴心时代”。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是一个主次分明、结构清晰的有机体系。它由“思想—文化传统”与“艺术—美学传统”两个互为表里的系统构成基本框架。思想—文化传统以“启蒙—教化传统”与“个性解放”传统的互相制约、互为消长,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两大核心传统及其运动规律。由这两大核心传统派生出两大次生传统:大众化传统和继承—借鉴传统。它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两大核心传统本身得以实现的途径。时代精神—核心传统—次生传统,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传统面目清晰的“平面结构图”。艺术—美学传统则由现实主义传统和浪漫主义传统的相消长,以及现代主义传统的发展变迁构成基本框架,以“时代精神”为原动力,思想—文化传统与艺术—美学传统两大系列,组成立体的中国文学现代传统“金字塔”。这一“金字塔”式的“文学传统结构图”,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的“精神结构图”及其“精神运动图”,它从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线图”

梁启超把清末民初这个充满冲突与融合、承传与变异、保守与创新、迷惘与机遇,内涵极其丰富而变化万端的历史时期,称为“过渡时代”。他以其特有的激情和诗意欢呼这一“过渡时代”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

〔1〕 温儒敏:《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温儒敏、陈晓明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义。^{〔1〕}在他看来,“过渡时代”是一个民族百年、千年难遇的变革创新、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民族继往开来、获得新生的伟大时代。但同时,“过渡时代”因其一切未定,充满变数,犹如惊涛骇浪、歧途丛生的“恐怖时代”。处于“过渡时代”的中国就犹如海中孤舟,远离旧岸而前途茫茫;多种选择,多样后果,都有可能。中国文学正是在梁启超所描述的这种“过渡时代”的惊涛与暗流丛生中经历其历史转型而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们把中国文化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历程,概称为“转型时代”或广义上的“过渡时代”,大致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40年代。在此期间,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路线,跨越了层次分明的三大历史阶段:19世纪中叶的酝酿—萌芽阶段、世纪之交的初步形成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凝定阶段。这三个前后相连的历史阶段,与整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可称之为中西文化“交会时代”、新旧“过渡时代”和新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温儒敏指出:“如果深入到历史内部认真观察,会发现,现代文学传统的生成,其过程非常复杂,远比以前许多文学史的描写要曲折而丰富。”^{〔2〕}现代文学传统凝结与流变的“路线图”,也即是文学传统“在过去和现在的作品之间存在的一种宽泛的、不完整的和不断变化的一致性,它是个充满弹性的动态结构”。^{〔3〕}

第一阶段:中西文化相逢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萌芽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运动半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以惊恐的目光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466页。

〔2〕 温儒敏:《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温儒敏、陈晓明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3〕 王中:《现代文学语言传统与当代写作》,温儒敏、陈晓明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和惶惑的心态,承受着西方近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但中国社会上下,从朝廷、官僚阶层到普通民众,并未睁眼看世界,实现思想的觉悟,仍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庚申(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才有少数有识之士真正认识到“非学西洋不可”。然而此时,“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1〕作为最具“惰性”的审美世界,在此期间,更是在以往的传统轨道上悠然前行,并不具备多少现代性质。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他一系列失败,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特别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役,才真正震动中国朝野。人们开始突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功利目光,理性地打量西洋文明。1861年1月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及其随着开始的有声有色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从上到下,观察世界的目光及思想观念的历史性变化,标志着中华民族迈开了“自强图存”的切实的第一步。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积极引进外国先进设备与科技、翻译西洋书籍、派遣幼童留学、创办新式教育等举措,表现出中国社会的觉醒,无形中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蜕变、转型的社会背景。

此时期中外士人的文化活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温床,许多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如傅兰雅(John Fry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在献身宗教事务的同时,也为传播西方文明、消除愚昧、移风易俗以改造中国社会做出真诚努力。而他们的文化交流事业大都通过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有效途径——文学创作来实现。其直接效果,就不仅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外文学的交流,更在实际上启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步伐。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为传教和传播西方文明,在中国创办了许多中文报刊,特别是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万国公报》,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西方人士在中国创办的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这些报刊尽量使用浅近文言文和中国习惯表达法以扩大在中国社会的影响。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沈渭滨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